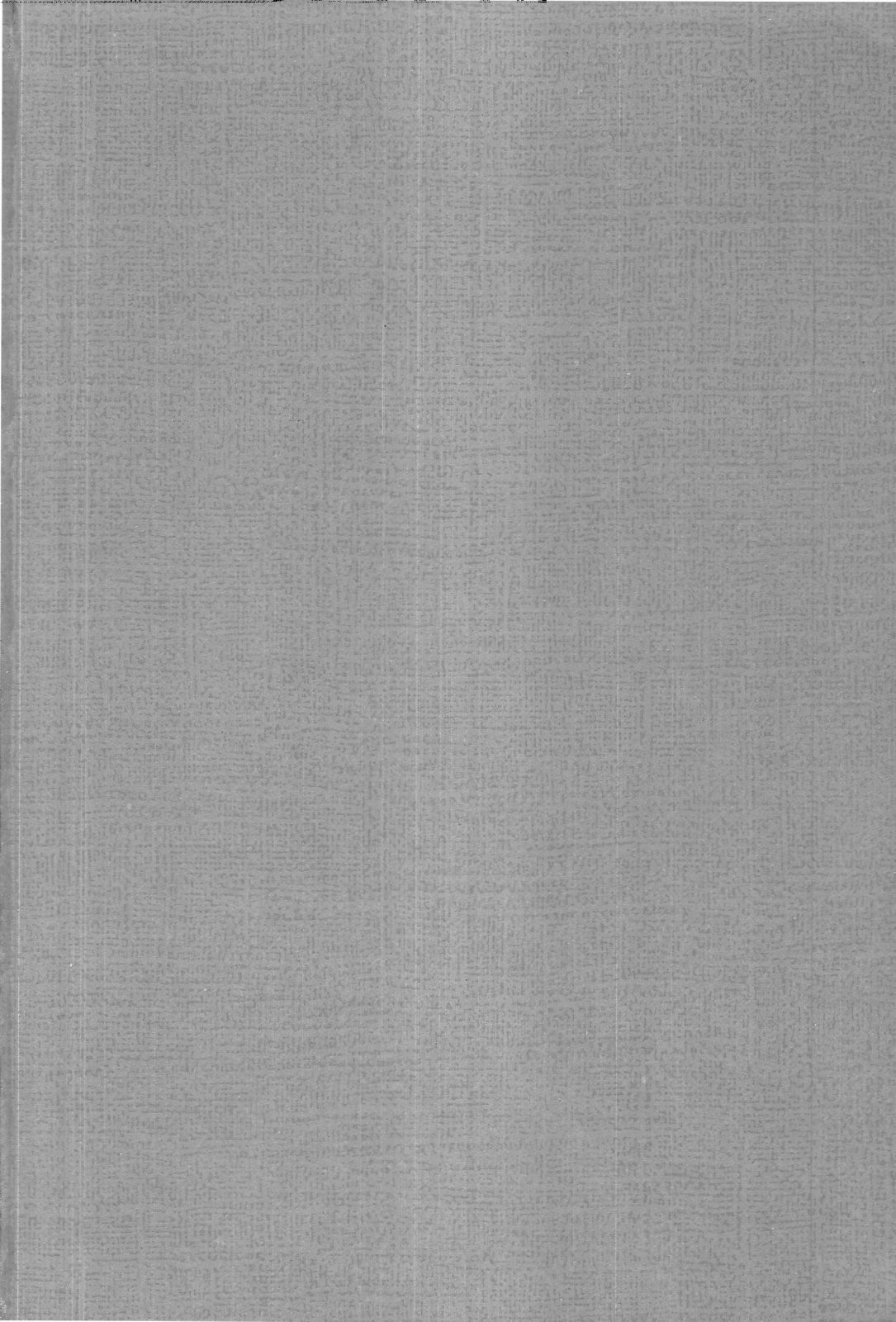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蒋良骥及其
《东华录》研究

陈捷先 著





中華書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蒋良骥及其
《东华录》研究

陈捷先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委 员

龚书铎 王思治 经君健 程 歆
杨 珍 夏明方 陈 铮

谨以此书献给

侯友兰女士

总 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它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

总 序

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份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

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目 录

序.....	王思治
学术之路常青	
——恭贺陈捷先教授《蒋良骥及其〈东华录〉研究》	
定稿.....	冯尔康
一、小引	1
二、蒋良骥的家世	4
三、蒋良骥的生平	20
四、蒋氏《东华录》作者考订及其触讳内容与对清末史书的 影响	42
五、蒋良骥《东华录》的版本	68
六、谈日本所见的蒋氏《东华录》	106
七、蒋良骥《东华录》刻本错误举隅	131
八、蒋良骥《东华录》刻本新增文字来源初探	148
九、蒋良骥《东华录》平议	180
十、蒋良骥的史学素养	207
十一、蒋良骥编载《东华录》的动机臆测	241
十二、蒋氏《东华录》中透现的经世思想	269
十三、结语	300
十四、后记	307

序

王思治

蒋良骥，字千之，广西全州升乡石冈人。乾隆三十年十月，清廷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良骥入馆任纂修。时《清实录》等外间不得一见，良骥因任史官，能看到大内秘藏、皇家文献。良骥职司撰修列传，于是“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以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以片纸录之，备遗忘，信笔摘抄，逐年编裁”。积之既久，卷帙成书，因史馆在东华门内，故名《东华录》。蒋氏《东华录》，开创了有清一代史书的又一体裁，继之者有王先谦《东华录》（至同治朝）、潘颐福《东华录》（咸丰朝）及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东华录》）。

蒋氏《东华录》在嘉庆年间已有多种抄本广为流传，道光时始有不同刻本。而今有北京中华书局、山东齐鲁书社之标点排印本。

蒋氏《东华录》因录存有清太祖至雍正十三年、清初五帝六朝（清太宗皇太极年号有二：天聪、崇德，故曰六朝）不少珍贵史料，故抄本流传问世，便倍受重视。奕赓《重订〈东华录〉序》说：“夫开国之宪章，列圣之鸿谟，秘府记载，世人鲜覩，士大夫间有抄存，俱锦函楹匱，不肯轻易示人。”今天，蒋氏《东华录》已是治清史者必备的架上之书。然而，如此一部史学“名著”，不但作者的身世、生平知之不详，且蒋录中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亦未见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陈捷先教授三十年前即已关注蒋良骥其人及其《东华录》，早

已有若干篇专论问世。今设题十四(见本书《目录》),搜罗中外史料,分析、考证,对蒋良骥及其《东华录》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作者说:“希望能给蒋良骥《东华录》写出一点能让大家共信的结论,为清史上一位名人一部名著解决多年来令大家疑虑费解的一些问题。”——这是本书撰述的旨趣,而最终成书,已历数十寒暑,潜心索求,锲而不舍,远非“十年磨一剑”,可谓更有甚焉。

我有幸先读为快。开卷有益,印象较深者有二:一是治学贵在精深;二是评说古人及其著作应“知人论世”。请试言之:

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积累与运用知识的过程,故曰“治学之道”。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以至于“书破”,则非反复研读、精读不可,倘若浅尝辄止,有似“襄阳走马客,意气自春生。朝嫌剑花净,暮嫌剑花冷”。对所研究题目,尚未洞悉,便急于动笔,势必无功而返。读本书,可以窥见作者之于蒋氏《东华录》,浸淫日久,用力颇深,已然“滚瓜烂熟”,旁及《清实录》等,也是了然于胸,故书中每一论题,大量引用蒋录各种版本史文,又用《清实录》等文献,或档案,进行比对、勘订,论其得失,阐释论题之主旨与作者之见地,且有相当细密者。如蒋录所摘抄“红本”资料,作者指出,全书仅有顺治朝、康熙朝共六条,共计五百〇五字,按序分别为三十七字、二百一十一字、五十四字、一百四十四字、二十四字、三十五字。如此计算字数,以证实蒋录摘抄红本“实在是占了微不足道的分量”,足见一丝不苟。书中大量引用蒋录,取舍从容,似乎左右逢源,之所以能得心应手,是基于对研究对象的熟读与熟悉,并进而“精读”,试举一例:书中摘引了蒋录中多条有关科举的史文,作者说:“相信足以揭露清初教育与科举弊端实状,……读来令人身入其境,对事实真相更能有深切了解。”读书至于“身入其境”,潜心学业,于此可见,自然对史实能有深切的了解。

蒋录自嘉庆年间有抄本流传问世,因多人传抄,抄家之误,所

谓“书三写鲁为鱼，虚为虎”。无论抄本、刻本，错讹甚多，清人早有“鱼鲁豕亥，不堪寓目”之评。即使中华书局版、齐鲁书社版，虽作了一定校勘，然仍未能尽善，已有学人撰文指疑，本书也有专题一一论列。而有关蒋良骥之史学修养、编录动机、经世思想，等等，则论者不多，而书中均有专题论述。作者有言：蒋良骥“编载《东华录》的动机，更值得吾人注重与推崇”。因有《蒋良骥编载〈东华录〉的动机臆测》一题加以论述。蒋氏之所以编载《东华录》，是“乾隆前期以暴露清宫内幕为主题而写书，似乎成了一种风气”对蒋氏的影响（如蒋录多触讳内容），以及蒋良骥的籍贯、父亲、业师、朋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者旁征博引，论人论事，视野开阔，用实证发明蒋良骥编载《东华录》的动机，是由历史时代背景、与蒋良骥个人的经历以及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虽然，作者说，是对蒋氏编载动机的“臆测”，非定评以示自谦，实则是以卓识史论所作“知人论世”的分析与叙论。

本书的又一特色，是在论述蒋录得失的同时，每每有“这是在引用蒋录时应该注意的”之类的提示。钱大昕说：“史为传信之书。”历史研究贵在求真求实，倘若论述所据之史料有误，则不可能成为信史。由于蒋良骥对清初之史实研究不深，更因“鲁鱼亥豕”诸多错误，作者一再提醒在引用蒋录时应避免以讹传讹。由是观之，作者力求匡正蒋录之错误，以飨读者，故本书之面世，相信将嘉惠学林，对清史研究有所裨益焉。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十月

学术之路常青

——恭贺陈捷先教授《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定稿

捷先仁兄在台湾大学荣退之后，一度创办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所，这十年的半退休、半授徒之中，继在台大的卓越研究之后，更是笔耕不辍，而且在学术之路上越发显示出两个特点，其一是致力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向大众介绍历史知识，撰著清代前六个皇帝的“写真”，即《努尔哈齐写真》、《皇太极写真》、《顺治写真》、《康熙写真》、《雍正写真》及《乾隆写真》，还有“以古鉴今，痛下针砭”的学术杂文集《不剃头与两国论》，主编一套《清史事典》（以上各书均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印行）；其二是撰写学术专著，有《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和《东亚古方志学》的联袂问世，如今又完成潜心研究的《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以下简称“蒋录研究”）一书。尔康曾奉捷先兄之命，为《东亚古方志学》、《康熙写真》写过“序言”、“推荐人的话”，今又拜读“蒋录研究”的定稿本，而且知道他写作的局部过程，如今尔康经加拿大邮寄蒋良骐的有关论文，八月他从友人处得知“蒋录”有齐鲁版的信息，立即寻觅，因而增写了若干内容。今见如此呕心沥血之作，更令尔康佩服捷先兄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遂写出拜读“蒋录研究”的心得。

蒋良骐的《东华录》，一般认为是史学名著，清史研究必须参考的原始文献。然而当代学者基本上不知道蒋氏的为人，对他的史学素养、此书得失所在、如何正确利用也是不怎么清楚的，不免多